

##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内蕴\*

乔咏波 龙静云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伦理的视角看，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三大特色：一是充分诠释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目的；二是在选择何种经济体制的伦理价值取向上，重申“两个不能动摇”，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的思想，既否定了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取向，又摒弃了“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取向；三是以共享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回应和拓展了发展伦理学关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发展的价值观是“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和自由”。

【关键词】习近平 政治经济学 以人民为中心 两个不能动摇 新发展理念

作者简介：乔咏波（1987-），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龙静云（1957-），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9）。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范式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生产的目的、财富的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特色。习近平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之一，其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之一恰恰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伦理之维”，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意义都十分重大。

一般认为，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可以统辖经济学的《政治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各自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的生活。”<sup>①</sup>这就是说，城邦或共同体的最大的目的，在于使城邦或共同体内的每个人都享有美好生活。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有两大宗旨：“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13&ZD0037）的阶段性成果。

①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sup>①</sup>由此可见，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密，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蕴含着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每个人享有“自己应得的一份美好的生活”或“富国裕民”作为最崇高的宗旨。只是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密以降的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中所关注的“民”，都是位居当时社会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或集团中的“民”，而非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这诚如西斯蒙第所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但“亚当·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对待财富的，而不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sup>②</sup>。而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sup>③</sup>。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它们只关注生产和增加生产，“似乎忘记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sup>④</sup>。唯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坚持以全体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全民的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前进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sup>⑤</sup>“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sup>⑥</sup>列宁也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sup>⑦</sup>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继承和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富国裕民”的伦理思想，又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理念。

结合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可以发现，其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核心伦理价值或伦理原则正是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更直接地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未来新社会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而且这种理念是坚持我国现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例如：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党的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明确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现阶段的具体目标，就是要让13亿多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成果。为此，就必须把消除贫困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中国成功地使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在减贫方面，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并

① (英)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页。

② (瑞士)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60页。

③ (瑞士)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9页。

④ (瑞士) 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564页。

⑦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在少数落后地区，依然有3000万人处于不得温饱的极贫状态。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同志坚定地指出：“扶贫开发工作是我们的一个突出短板，是影响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因素，要举全国之力，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sup>①</sup>也就是说，补齐扶贫开发这个短板，是由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而决定的。对于扶贫开发工作，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一定要扭住精准，注重提高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目前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不只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口头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行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的热爱，其中尤其是对贫困人口的深切伦理关怀，这既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富国裕民”伦理精髓的借鉴和吸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的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伦理观念的直接继承和最新发展。

## 二

在西方，斯密以降的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在关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伦理取向上，大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持赞同态度，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说过：“正当的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是以公平原则（即报酬与努力成比例）为依据的。因此，要判断所有制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假定使这一制度违反这一原则的每一件事都已纠正。”<sup>②</sup>但在事实上，现有的私有制度对“没有任何功绩，也不作任何努力而占有别人劳动和节欲的成果的人也给予保证”，这种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严重存在的，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但不会促进私有制合理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同这一目标相抵触”<sup>③</sup>。因此，“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轻如鸿毛”<sup>④</sup>。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伦理取向有一个逐步优化和完善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sup>⑤</sup>。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列宁也指出，在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

①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31日。

②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6页。

③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6页。

④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sup>①</sup>。“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也只是在这个范围，‘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sup>②</sup>这说明，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一开始也是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来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然而，社会主义初步实践的结果促使列宁倡导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即采取迂回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1922年11月，病中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sup>③</sup>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采用迂回的方法，即国家所有制经济只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即“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经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于农民、中小企业和商业则允许私人经营。像商业中的合营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的，而且是外国资本家的，另一部分属于我们”<sup>④</sup>。针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非社会主义的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的疑问，列宁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中，我们不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估计过高，“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sup>⑤</sup>。“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sup>⑥</sup>列宁还指出：“我认为这个主要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sup>⑦</sup>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我国新时期的经济改革，具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走过弯路。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非公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严加批判，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仍然坚持“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但我们党首次肯定“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决不应以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发展为条件。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sup>⑧</sup>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进一步明确宣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6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8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8-719页。

⑦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0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因而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sup>①</sup>。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思想，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继续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以明晰产权为重点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民营企业做强做大<sup>②</sup>。

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充分汲取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及教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在对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伦理取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还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更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则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表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产权保护总体要求的首要原则就是：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意见》第七条还特别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

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各类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因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企业和投资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sup>①</sup>。由此可见,习近平政治经济学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不能动摇”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的思想,既否定了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取向,又摒弃了“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取向。这是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则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为此,建议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建议稿进行谋篇布局。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sup>②</sup>

应当看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聚焦于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为当代中国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制定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是对发展伦理学核心问题的准确把握,是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从西方经济学演进的历史看,发展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才被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而建立起来。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发展经济学没有很好地经受住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检验,曾经蔚为壮观的发展经济学开始走下坡路,发展经济学转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将发展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是片面和错误的。发展这个主题的性质迫使学术界打破各自学科的界线,形成了新的共识:“发展问题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没有哪个单一学科能够包罗,更不能提供解决办法。”<sup>③</sup>因此,专门研究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发展伦理学应运而生。“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Denis Goulet, 1931—2006)指出:“发展指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同时地,不可分割地,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sup>④</sup>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核心问题,可以“把它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sup>⑤</sup>。根据德尼·古莱的理解,发展伦理学就是把以前单纯从经济视角衡量发展拓展为从人类文明进步的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8日。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4日。

③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④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本质角度来看待发展,“使发展最终意味着生活质量以及走向各种文化所表述的价值准则的社会进步”<sup>①</sup>。追求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让所有成员从发展中分享和获得什么样的成果,这两个问题是同样重要的。“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sup>②</sup>由此可见,发展伦理学是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和值得的”这一重大问题所作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对发展的目的追求、发展的价值取向、发展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行追问和研究的伦理学学科之一,是全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引导人们过一种美好生活所表达的一种伦理诉求。而与此相类似,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住了发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其关注的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存在,追求的目标是让人民大众过上美好生活,建立仁爱公正社会,在人类群体与大自然之间建构起和谐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sup>③</sup>。习近平同志这些论断中所蕴含的伦理意义,既与德尼·古莱的《发展伦理学》思想相类似,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伦理原则。

这是因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最突出的伦理价值就是积极回应和拓展了发展伦理学的某些价值目标,并且是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实现这种共享发展的价值目标。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例如,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比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sup>④</sup>。这显然高度吻合了美好生活的第一个价值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而对实现美好生活的第二个普遍价值目标“尊重”,习近平同志在提出“新发展理念”的同时,还宣布了具体实现的对策。他指出,现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其中,2.5亿人口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这一部分人虽然居住在城镇,但他们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些不平等会带来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要加快落实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让2.5亿在城镇还得不到平等“尊重”的外来人口中的40%在“十三五”期间首先享有在城镇中平等受“尊重”的权利,这是补齐我国发展中另一大短板的需要。对于美好生活的第三个跨文化价值目标“自由”而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虽没有直接标明,但其中所蕴涵的价值指向恰恰是阿马蒂亚·森所言的“享受人们有理由珍惜的那种生

①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②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④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4日。

活的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读书识字、享受政治平等参与等等的自由”<sup>①</sup>。实质自由的提升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之一，既否定了唯经济增长的片面性，也凸显了人的价值提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合理性。按照森的说法，“实质自由”在发展中既可以起建构性作用，又能发挥工具性作用。前者是关于实质性自由对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扩展人的上述基本自由的作用，后者“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entitlements）是如何为扩展人类的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sup>②</sup>。森的这一思想构成了1990年以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I）——特别是用来反映各国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而关注人民“实质性自由”的提高，始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奋斗目标。早在2012年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他就宣告：“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sup>③</sup>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在把“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特别要把“蛋糕”分好。“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sup>④</sup>“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sup>⑤</sup>显而易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所有这些措施和努力，就是在切切实实地扩大和提升全体人民在衣、食、住、教、医等方面最急需、最广泛的“实质自由”。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传承了我国数千年来“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经济伦理传统，也向世界展现了我国实现发展伦理学关于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的途径和方法，进而向世界展现了我们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行的强大能力。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 （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4]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编辑：张 桥）

①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②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④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  
 ⑤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